

# 基于不同视角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闫伯汉

**[摘要]** 文章在梳理有关留守儿童研究的调查活动、研究取向的基础上,致力于以研究视角为主要框架述评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在已有的比较清晰或初露端倪的三个研究视角——群体比较视角、动态视角和再生产视角下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 留守儿童;群体比较视角;动态视角;再生产视角

**[作者简介]** 闫伯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北京100084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4)09-0129-06

留守儿童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引发的一个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过程启动了我国劳动力流动加速发展的历史。进入90年代,随着城市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业化过程的升级和扩展,“民工潮”年复一年地涌动,农村劳动力稳定地、大规模地向城镇、沿海或发达地区流动。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农民工未成年子女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sup>①</sup>。一方面,一部分农民工将子女带在身边,但户籍仍然留在农村,这些子女即为农村流动儿童。另一方面,由于收入低、住房差、工作忙且工作时间长、就学困难、考试升学限制等诸多现实问题,更多农民工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农村,形成亲子分离的局面,这部分子女即为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同时产生,且前者数量一直明显多于后者,更重要的是留守儿童要面对亲子分离造成的诸多困境。以此推断,留守儿童应受到更早更多或至少与流动儿童一样的关注,但事实上最早受到关注的是流动儿童,这或许与研究视野有关。早期研究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造成的影响方面,放在由于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制约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流入地的权益保护方面。对于流出地,则过于强调劳动力流动的正面效应,如汇款提高了家

庭的支付能力,拉动了流出地的消费,基本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忽视了面临教育、心理、健康诸多困难的留守儿童群体。

直到21世纪初,随着“三农”问题的升温,作为“三农”问题附属问题的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才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一些媒体宣传报道的关于留守儿童由于无人看管出现的严重事件,更是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会议强调了对留守儿童群体的重视,并在会议前后委托了几家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调研,从此真正拉开了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序幕。之后,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细致呈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发展状况,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结论和对策。

本研究在梳理相关调查活动、研究取向的基础上,致力于以研究视角为主要框架述评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在不同视角下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与方向。

## 一、调查活动、研究取向与研究危机

### (一) 调查活动及特点

最早的留守儿童专项调查是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受香港乐施会资助进行的“农村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07JJD840198)

<sup>①</sup>以留守儿童为例,据2010年六普数据推算,全国有留守儿童6102.6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9%,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5年间增加约242万。

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状况研究”调查。之后稍具规模且有影响的调查活动有:2002年福建师范大学在福建省泉州市、福清市、沙县进行的“留守孩”调查;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在湖北省三个县市进行的留守儿童调查;2004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受教育部委托在三省五县进行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调查;2004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中西部10个省份的115个自然村进行的“全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调查;2004-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受福特基金资助进行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影响”调查;2006-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进行的“农民工流动对儿童的影响”调查。

已有的调查活动极大地增进了对留守儿童群体的了解,但也存在着不足:(1)调查主体主要是受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委托资助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缺乏更接近留守儿童的中小学教育机构的参与;(2)调查地点的选择主观性较强,或者针对性地选择流出人口较多省份的一个或几个县市、乡镇、村庄,或者有意识地选取不同经济水平的若干区县,缺乏全国范围内深入、系统、专题性的研究;(3)调查对象多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少有为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关注,更缺乏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留守儿童的学业状况、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的追踪研究;(4)一些定量研究的抽样方法、测量工具语焉不详,或缺乏规范性;(5)调查报告多为描述性,且低层次重复现象严重,缺乏深入系统的过程机制分析。

## (二)全景式的研究取向与研究危机悖论

在研究取向方面,教育问题(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德育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是留守儿童研究历程中最早的研究取向,也一直是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有学者统计,2007-2009年约704篇期刊论文中,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的论文约占37%<sup>[1]</sup>。随着留守儿童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研究也日益扩展深入,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各个方面——教育、心理、健康卫生、社会化、社会行为、监护模式、社会支持、权益保护等,越来越呈现出全景式的研究取向。

但研究内容的全景式取向并没有给该领域带来繁荣的景象,相反,目前阶段的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充满了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研究报告的低层次重复,研究过程中先入为主的问题化趋向,缺乏对细化的研究结果的梳理整合,相关问题的研究

者在各自研究的狭小范围内自说自话。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统一综合的分析框架,缺乏清晰明确的研究视角意识。因此,为推动留守儿童问题研究,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评述。

## 二、研究视角

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中已有的比较清晰或初露端倪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个:群体比较视角、动态视角、再生产视角。

### (一)群体比较视角

群体比较视角源于对留守儿童“问题化”的反思。留守儿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新闻媒体及学术调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无论是新闻媒体报道,还是早期的调查研究,呈现给公众的多是“问题化”的儿童群体形象。

《光明日报》较早关注到留守儿童问题,2002年就有相关报道:“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队伍中的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生活和教育的缺陷,无法享受同龄孩子的‘花季’‘雨季’……辍学失学现象严重……德育智育发展滞后……心理生理发育失衡。”<sup>[2]</sup>之后,一些媒体跟进报道,特别是2004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后,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新闻媒体往往在亲子分离必然对未成年子女造成负面影响的假定下以少数个案作为切入点,因此,其报道方式必然是对“问题”的过度聚焦,关注点也往往是有关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如遭受性侵犯、偷盗、抢劫、自杀、他杀等。在新闻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轮番的、悲情式的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必然导致公众的留守儿童群体“问题化”印象。

学术界早期的一些专题性调查发现也多强调留守儿童的“问题”,如:行为上,在家不听祖辈教导,在校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性格上,任性、冷漠、内向、孤独;学习上,学业成绩差者比例高,厌学、逃学倾向明显<sup>[3][4]</sup>。相比新闻媒体对个案的关注,学术界大样本调查似乎更显科学性、更具说服力,影响力也更大。因此,调查结果的发布或发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更广泛的讨论,同时也使留守儿童即为“问题儿童”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针对留守儿童研究的问题化趋向,有学者进行了反思:研究中普遍的潜在假设——“亲子分离引发家庭教育的断裂,必然对儿童的行为、情感、心理、学习等诸多方面带来不利的影响”是否存在问题?留守儿童身上存在的问题是真实的存在,还是社会与学界的建构?是否存在被夸大的嫌疑?因

为,虽然有留守儿童在学业、心理、行为等方面表现不良,但从经验层面看,同样可以找到许多学习优良、自信向上、生活自理能力强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其他类型儿童是否同样存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群体间的比较研究。

已有研究的比较多在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间进行,比较内容涉及学业行为、学习成绩、心理、生活状况、社会化、社会支持、健康卫生等方面<sup>[5-14]</sup>。虽然一些研究在抽样方法、样本代表性、测量工具,甚至结论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矛盾,但通过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至少使我们明白有些所谓“问题”可能并非留守儿童所独有,同样存在于非留守儿童身上。

群体间比较的内容不断扩展、细化,使我们对留守儿童群体有了更全面、细致的了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对现状的描述,愈加重视对影响机制的分析,群体内(留守儿童内部群体)比较成为自然的研究逻辑,出现了许多依据不同维度(留守模式、留守经历、监护类型、留守时间长度、分离年龄、支持模式等)对留守儿童进行划分的群体内比较研究<sup>[10][15-25]</sup>。这些研究细致呈现了不同因素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个性素养的影响,与便于把握留守儿童特点的群体间比较研究一起扩展了研究领域,推动了研究进展。

但已有的群体比较研究参照群体的选择和处理存在不足,留守儿童的参照群体多为农村非留守儿童,少有与流动儿童、城市本地儿童的比较,更缺乏不同类型儿童群体间的系统组合比较,而且比较时对内生性问题重视也不够。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的比较只能说明留守儿童的弱势或者有些问题并非为留守儿童所独有,但只有以城市儿童为参照群体才能说明城乡差异的影响;同样道理,只有以流动儿童为参照群体才能说明流动的效应,而且只有进行不同类型儿童群体的系统组合比较才能深刻理解影响留守儿童成长发展的因素。而不处理内生性问题的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的比较结果并不必然说明亲子分离的影响,这是因为存在着流动的选择效应,即农民工的流动是非随机的,流动与否受到身体状况、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甚至子女的数量、子女的学习生活行为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决定了外出务工者与非外出务工者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一点已为研究所证明<sup>[26]</sup>。系统性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外出务工者与非外出务工者应对不利事件

的能力不同,甚至子女应对不利事件的能力也存在差异,这些重要混淆变量的影响必然体现在观察到的结果上,无视其存在的比较可信度必然不高。

因此,有效比较的前提在于引入处理内生性问题,消除混淆变量选择性误差的方法。倾向值匹配法是新近发展出的一个很好地解决了多混淆变量控制问题的方法<sup>[27]</sup>。但到目前为止,在农民工子女研究领域,仅有少量文献<sup>[28-29]</sup>应用此方法分析了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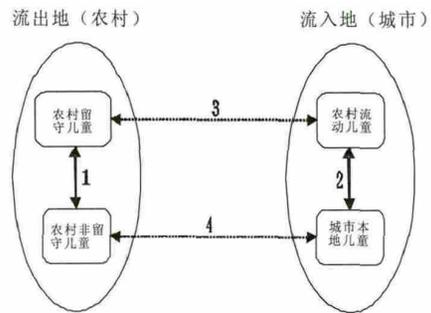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类型儿童的系统组合比较

但仅消除内生性问题的两组比较还不够,还需要群体间系统的组合比较。下面结合图1,以农民工流动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为例说明。在以倾向值匹配法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步骤“1”,即比较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差异,之后对差异取均值,此均值就是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成绩的平均影响效应。但这仅仅说明了农民工流动后果的一方面,即“分离”对留守儿童学习的影响,另一方面“随迁”又是如何影响学习成绩?深入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流动的话,其学习成绩将会怎样?这就需要在倾向值匹配的基础上进行步骤3(与流动儿童的比较),但要注意,得到的成绩差异,既有流动效应也有城乡差异效应。为了排除城乡差异效应,还需要进行步骤2(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的比较)。

除缺乏系统的群体组合比较外,已有的群体比较研究也缺乏统一综合的分析框架。从一个研究域的长远发展看,在研究历程中把一个问题分解为多个问题,把一个群体细分为多个群体,这种由“一”变“多”虽然是必须的,但若不加整合到一定程度,可能使整个研究域面临危机。

## (二)动态视角

动态视角是在对留守儿童定义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的。从外出父母的数量、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孩子的年龄三方面定义留守儿童是学术界的普遍做法<sup>①</sup>。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假设了父母的

①虽然大多定义都围绕着这三个方面,但研究者在具体定义时却存在诸多分歧,统一清晰的“留守儿童”定义还没有形成。分歧点主要表现在:父母中有一方外出(部分亲子分离)的孩子就算留守儿童,还是父母双方都外出(完全亲子分离)的孩子才算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时间以3个月、4个月、半年还是1年进行划分?儿童年龄的上限应为18岁、16岁还是14岁?

流动性,留守儿童的非流动性。事实却是,不但父母在“乡-城”、“城-乡”之间往返流动,留守儿童也常常是变动不居的,他/她们并非始终“留守”,也时常随父母在老家与务工地之间“流动”,甚至还有监护环境改变带来的“留守”中的流动,转学(不算升学)带来的“流动”或“留守”中的流动<sup>[30]</sup>。总之,“留守”对留守儿童来说,只是暂时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贯穿生活始终的一种属性,这种留守状态随时有可能因为父母回家或跟随父母进城而结束<sup>[31][32]</sup>。因此,应从动态生命历程的视角,从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两个维度的交互机制下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呈现儿童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流动和留守经历及其对他/她们生活、学习和个性素养的影响<sup>[33]</sup>。

其实,从研究目的方面讲,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往往注重分析“留守”这一状态或经历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若无视那些有留守经历但调查时已经不再“留守”的儿童(处于随迁状态或父母已回到农村状态的儿童)的经历,所进行的分析肯定会有较大偏误。而考虑“留守”或“流动”经历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设计阶段就进行相关准备,更需要以动态的生命历程视角来分析这些经历怎样与变化着的环境一起影响了儿童成长。

但在留守儿童研究的实践领域,已有的研究多属静态性分析,以动态生命历程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还较少。唐有财虽然强调了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分析问题的重要性,但其研究明显缺乏实证材料支持。关注“保护因素”(使个体在危险环境中避免不良发展结果,规避不良发展过程进而达到积极发展的因素)的心理弹性理论虽有追求动态视角的驱动<sup>[34]</sup>,但引入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实证研究<sup>[35][36]</sup>往往只强调对影响因素的关注,而缺乏在动态视角下对危险因素、保护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

动态视角要求既要关注“危险因素”可能对留守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要看到“保护因素”对留守儿童的支持作用;既要关心留守儿童当前的“留守”状态,也要注意他/她们曾经的“流动”经历;而且,动态视角特别强调要把儿童的经历与周围环境的变动结合起来,强调分析不稳定的生活环境对留守儿童影响的过程机制。这种视角相比注重群体间、群体内差异的比较视角,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必将极大地推动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进展。

### (三)再生产视角

留守儿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把亲子分离看作问题的实

质<sup>[25][32]</sup>。反向思考,如果亲子分离是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则意味着留守儿童是一个跨越城乡、国界的历史性群体,为何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献关注的对象都是“中国农村不能随外出务工、经商的父母一起生活而留守在家乡的儿童”?仅仅因为其规模的庞大?显然不是。此群体受到广泛关注主要因为他/她们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子女,而且不可否认其将是农民工的主要后备军。从此意义上讲,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附属品,是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工再生产、阶级再生产问题。这种视角的转换,强调了劳动力更新过程的“更替”方面(对子女后代的养育)<sup>[37]</sup>,对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这种视角的研究,不仅会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更会关注其成长环境;不仅会关注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也会关注造成此现状的制度性、结构性原因。所以,持有这种立场的研究者不仅认为亲子分离是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特征,更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产生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这种主张与从儿童成长角度对留守儿童的认识相比,虽窄化了外延,但所指更加明确,也更体现了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

而且,再生产视角整合了农民工研究与农民工子女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议题,关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文献众多,但很少有文献关注农民工的再生产问题。20世纪初以来,农民工子女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引发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极少有研究把它纳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议题。也就是说,长久以来,关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与关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行其是,缺乏对话。再生产视角将留守儿童问题看作农民工问题的附属品,认为处于多种不利结构之中向上流动受到强力阻滞的他/她们,必然是明日农民工的主要后备军,这样就把农民工研究和农民工子女研究整合为一。

在农民工研究的实践领域,学者沈原等注重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方面(农民工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独特模式<sup>[38]</sup>。而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另一个要素——“更替”(子女后代养育)的关注则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熊易寒以流动儿童为对象,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制度性地自我放弃的一面。而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通过“反学校文化”获得自尊的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

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这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sup>[39]</sup>。周潇的研究对象不仅有流动儿童,也有留守儿童。她总结了“中国农民工‘劳动力更替的低成本组织模式’”的两种形态:一是农民工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城市完成,但是孩子则被留守在乡村。另外一种形态是农民工将孩子带入务工所在的城市,但孩子却在城市处于一种被高度边缘化的状态。这最终成为了一种农民工阶级地位再生产的机制<sup>[40]</sup>。谭深则发展出“拆分型家庭模式”的概念,强调了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及有利于资本的低工资、低福利制度与这种模式的强烈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维持留守儿童基本的正常生活和成长的传统支持资源的减少<sup>[30]</sup>。

从已有研究并结合再生产理论看,再生产视角下的农民工子女研究既要关注宏观、中观的结构性力量,又要注重微观具体的过程机制分析;既强调结构性力量的形塑规制作用,又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无论是对结构性力量的研究,对具体机制过程的探讨,还是对主体能动性的分析,都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再生产视角下的农民工子女研究空间巨大。

### 三、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一) 批评

留守儿童的研究历程表明,相关研究虽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很多研究依然不规范。定量研究样本的选择多以便利性为考量,缺乏随机性,代表性存在问题;调查范围相对狭小,缺乏全国范围内深入、系统、专题性的研究;一些定量研究的测量工具或语焉不详,或缺乏规范性;调查报告的低层次重复现象突出。第二,缺乏系统的群体组合比较研究。已有的研究中,留守儿童的参照群体多为农村非留守儿童,两个类型群体的比较有时并不能充分说明影响儿童成长发展的因素,为了更深入地分析相关问题,需要进行多个类型群体的系统组合比较。第三,静态的分析多,动态的过程机制研究少。无视无论“留守”还是“流动”都仅仅是暂时的一种生活状态,而非贯穿生活始终的一种属性的研究,无法呈现儿童生命历程中的流动和留守经历,更无法分析这些经历对他/她们身心发展的影响。只有把儿童的经历与周围环境变动结合起来的动态过程机制分析,才能深刻揭示影响儿童成长发展的因素。第四,缺乏统一综合的分析框架。对留守儿童多维度的划分大大扩展了研究内容,使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但

围绕各子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各研究者自说自话,对细分后各子问题的研究结果少有梳理判断,因而没有构建出该研究域统一综合的分析框架。第五,调查对象多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缺乏对学龄前儿童的关注。学龄前留守儿童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据六普数据资料看,留守儿童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学龄前儿童(0-5岁)规模快速膨胀,达2342万人,占留守儿童的38.4%,比2005年增加了757万人,增幅达47.7%<sup>[41]</sup>。因此,应加强对学前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第六,研究多关注与亲子分离有关的家庭因素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对中观层面的社区、学校、同龄群体作用的分析不够。

#### (二)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上述不足,应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改进。除此之外,下列方面也应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第一,统一有效测量工具的设计。探究不同因素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点。而此类研究的关键在于对儿童成长发展的诸方面,如认知能力、情感、心理状况,进行有效测量。但已有研究的测量方法往往不统一,适用范围窄,缺乏可比性,效度也存在问题。以儿童认知能力测量为例,已有研究多以某次考试成绩或父母评价为依据。以某次考试成绩进行测量的问题在于,由于不同年龄、年级、学校、地区之间考试题目不同,难度存在差异,测量结果往往不具可比性。标准化测量结果是纠偏的常用手段<sup>[42]</sup>,但仍无法有效克服由于测量不统一产生的偏误。以父母评价进行间接测量的问题在于,由于父母长时间在外,无法详细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其答案多是依据某次考试成绩的笼统判断(如学习一般等),测量精度存在问题。因此,为使测量结果具有可比性,针对不同类型儿童按照相同方式使用统一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是必要的。而高效度的测量工具应用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系统的抽样调查,会使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更好。第二,对留守儿童的追踪研究。已有文献缺乏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留守儿童的学业状况、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的追踪研究。按第一批留守儿童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的话,如今他/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那么,他/她们的生活状况如何?留守经历对其今天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是否如再生产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他/她们仍然重复着父辈的足迹,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是否如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所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其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事件塑造着,而且这些经历事件的影响取决于它

们什么时候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他/她们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自身生命历程的<sup>[43]</sup>?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 [参考文献]

[1] 康辉,等.2007-2009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08,(1).

[2] 李陈续.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N].光明日报,2002-04-09.

[3] 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3).

[4] 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A].2004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论文(二)[C],北京大学,2004.

[5] 朱科蓉,等.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教育科学,2002,(4).

[6] 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2004,(10).

[7] 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1).

[8] 叶敬忠,等.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6,(1).

[9] 刘霞,等.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J].河南大学学报,2008,(1).

[10] 范兴华,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5).

[11] 陈丽,等.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生长发育与营养状况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10,(8).

[12] 董海宁.社会化结果: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0,(7).

[13] 张克云,等.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特征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0,(2).

[14] 赵苗苗.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大学,2012.

[15] 刘霞,等.小学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4).

[16] 杨菊华,等.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08,(1).

[17] 贾勇宏.留守儿童的德行失范问题研究[J].青年研究,2008,(4).

[18] 张莉,等.不同留守时间下儿童公正感的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5).

[19] 申继亮.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发展与环境作用[J].当代青年研究,2008,(10).

[20] 凌辉,等.分离年龄和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5).

[21] 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J].上海教育科研,2002,(9).

[22] 范兴华,等.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问题行

为比较[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2).

[23] 范兴华.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情绪适应的比较[J].中国特殊教育,2011,(2).

[24] 王东宇,等.影响中学留守孩心理健康的家庭因素研究[J].心理科学,2005,(2).

[25] 唐有财,等.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J].人口学刊,2011,(5).

[26]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7] 胡安宁.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2,(1).

[28] 陶然,等.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发现与政策含义[J].管理世界,2012,(8).

[29] 李云森.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2013,(3).

[30] 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31] 罗国芬.从1000万到1.3亿:农村留守儿童到底有多少[J].青年探索,2005,(2).

[32] 罗国芬,等.留守儿童调查有关问题的反思[J].青年探索,2006,(5).

[33] 唐有财,等.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及其社会化[J].中州学刊,2011,(4).

[34] Luthar S S, Cicchetti D, Becker B.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J]. Child Development, 2000, (3).

[35] 骆鹏程.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7.

[36] 李志凯.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4).

[37]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 London: The Thetford Press, 1985.

[38]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2).

[39] 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0,(1).

[40] 周潇.劳动力更替的低成本组织模式与阶级再生产[D].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

[41] 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EB/OL]. <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 2013-05-10.

[42] Kandel W, Kao G. The Impact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on Mexica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Performance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1, (4).

[43] 格伦·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M].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